

文章编号:1003-6636(2012)04-0103-05;中图分类号:F129;文献标识码:A

试论明朝时期的治黔方略与黔中城镇建设

范松

(贵州省文化厅,贵州 贵阳 550001)

摘要: 明朝在贵州境内掀起长达百余年的大开发,为僻处西南一隅多民族聚居的贵州带来了城镇兴建的契机。贵阳、安顺等黔中城镇的兴起,奠定了其在全省政治、军事、经济与文化的中心地位。这两座城市的兴盛,又有力地促进了贵州省境内的城镇建设,推动了贵州尤其是黔中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

关键词: 明代;黔中地区;城镇发展

The Strategy for Governing Guizhou and Urban Development in the Ming Dynasty

FAN Song

(Guizhou Provincial Department of Culture, Guiyang, Guizhou 550001, China)

Abstract: The more than 100 years' development in the Ming Dynasty brought about an opportunity to build cities and towns in Guizhou, situated in a remote corner in Southwest China. Cities in central Guizhou, such as Guiyang and Anshun, grew up and formed their role as provincial political, military, economic and cultural center. Their prosperity, in turn, promoted urban construction and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Guizhou, especially in central Guizhou.

Key words: the Ming Dynasty; central Guizhou economic zone; urban development

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历程显示,春秋战国之际是城市兴起的一个高潮,自此之后,城市的发展相对较为稳定,主要表现为从早期的草创,向逐渐扩大规模、完善功能方面发展,城市的类型并未出现明显的质的飞跃。直到两宋时期,随着封建商品经济的活跃,以“破墙开店”为表征的城镇才陆续在各地诞生并以较快的速度发展,这种变化相当于城镇发展史上的一次革命。

就贵州高原而论,因为僻处西南一隅,历史上虽出现过“鬼方”、“牂牁”、“夜郎”等一些强大到足与其他地方政权比肩的方国,但并不等同于产生了与中原地区同步的城镇。自两汉以后的近千年,因贵州社会生产水平日渐落后,加上大多数情况下没有被纳入封建国家经济发展的宏观视野,城镇的发展便长期徘徊在一种萌芽状态,直到明朝在贵州境内掀起长达百余年的大开发浪潮这种情况才发生改变,才真正开启较大规模城镇建设的进程。

一、明朝政府的治黔方略

由于地域辽阔,中国历史上城镇形成与发展的道路有着很大区别。如贵州这样的地区,既远离国家政治经济中心,又深受地形条件和交通的制约,生产水平较中原及其他省区落后,城镇化的兴起很难依靠自身的力量,不得不仰赖于中央政府的决策。

明初的贵州高原并无独立的行政建置,分属于湖广、四川、云南三省管辖,实际为上述三省毗邻的边地,由此,也突出了贵州高原在整个国家政治与军事上的权重。而黔中又是贵州高原的心脏,这一地区的稳定与发展,直接牵涉到西南版图的稳固,也是明代中央政府推行治国大计的前提。

收稿日期:2012-03-05

作者简介:范松(1970-),男,贵州贵阳人,贵州省文化厅文物局考古研究所馆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西南地方史、区域经济史。

明初基本沿袭元朝的各种制度,但亦陆续做了很大改动,军事方面的卫所制便是其中之一。为巩固统治,明政府在全国各地军事要冲设立卫所驻军。鉴于明初西南地区的形势,贵州是明政府设立卫所相对较多的地区。洪武四年(1371年)12月,“置永宁、贵州二卫及瞿塘关、汉中、阶文三守御千户所。”^①其中的贵州卫治所设于今贵阳,这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贵阳作为贵州高原政治军事中心的地位。

在征讨云南残元势力的战争中,为利于军队调动,朱元璋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下令建立贵州都指挥使司。按明王朝的管理体制,中央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地方设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分管地方民、刑、兵之权。贵州都指挥使司的设立,事实上已经隐现了明政府将贵州从湖广、云南、四川三省中分离出来,构建为省级行政区划的意图。

在设置贵州都指挥使司的同时,明朝政府设置了14卫,其中在贵州境内的有普安卫、尾洒卫、普定卫、黄平卫、乌撒卫、水西卫。时隔不久,黄平卫降为千户所,平越千户所升格为平越卫。到洪武十七年(1384年),撤乌蒙卫设毕节卫。次年,设五开卫于今黔东南,以后陆续设置层台卫、赤水卫、安庄卫、镇远卫、平溪卫、清浪卫、偏桥卫、威清卫、平坝卫、龙里卫、新添卫、都匀卫、及贵州前卫、铜鼓卫等卫所,总计24卫,分属于贵州都司与湖广都司。万历年间又设置了威远卫、敷勇卫、镇西卫。有明一代,贵州境内共设置有30卫,140余所。有人形容当时的贵州“诸卫所错布于州县,千屯遍列于田野。”

贵州卫所设置密集程度很高,在“戍兵屯田,就粮自贍”的政策及实行“开中”令纳米给盐的政策下,贵州高原的大规模屯田终于揭开了序幕。这种制度使汉族移民大批进入贵州。屯军和移民加强了明王朝在贵州的统治,也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推进了贵州历史前进的步伐。贵州大量的土地被开垦出来,黔中地区农业生产力也随之大幅度提升。

配合军事上设立卫所、屯田戍边的需要,明政府在贵州大力兴建、扩建驿路,着力改善交通闭塞状况。在明代修建完善的5条省际驿道中,除由四川叙永经毕节至云南的川黔滇道外,其余4条驿道均以贵阳为始发或终点。具体为由湖广至贵阳的湘黔驿道,由贵阳至云南的黔滇驿道,由重庆至贵阳的川黔驿道,由贵阳经都匀至广西的黔桂驿道。上述驿道构成了以黔中地区为中心,通往周边各省的交通干线,进一步确立了黔中地区的枢纽地位,更为重要的是沿驿道设置的驿站,由于经济文化交流的频繁,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发展为人烟稠密,商贸兴旺的城镇,黔中修文县由龙场驿发展而来便是其中一例。

在军屯的基础上实行“移民就宽乡”,即在官方督导下,由内地和相对发达地区向贵州大规模移民进行屯田垦荒,是明政府开发贵州的又一重大举措。按照明朝的政策,屯田分为军屯和民屯两类。“移民就宽乡,或召募或罪徙者为民屯,皆领之有司。”^②

“移民就宽乡”政策对黔中经济的刺激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明政府在贵州实行的“调北填南”,“湖广填四川”等政策,都属于官方主导的向贵州境内的大规模移民之举。加上从明初开始即募盐商于各边“开中”,让商人纳米换取盐引,分销各地,谓之商屯,更对贵州农业与商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而“开中”的商人们,往往筑台堡自相保聚,同样推动了集镇的形成与发展。

人口的大量聚集与商业、手工业的发展是封建城市形成的基础,教育则是确保城市生命延续的重要助力。早在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明政府已强调“声教所暨,无间遐迩”,要求贵州各土司“凡有子弟,皆令入国学受业”,“使知君臣父子之道,礼乐教化之事。”^③自后,明政府在贵州境内,尤其黔中地区陆续创办了一批卫学、司学、府州县学、书院和社学,这些不同形式的教育机构,大多集中在经济发达,人口密集的城镇,对城镇居民文化素质的提高与城镇本身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进作用。

明成祖永乐十一年(1413年)废除思南、思州两宣慰司,分其地为八府、四州,以此为基础,设置贵州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司治所设于贵州宣慰司城(即今贵阳市中心城区)。据明万历《贵州通志》载:“贵州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左布政使一员、左参政一员、左参议一员、右参议二员。”^④均各有司职。

①《明实录·太祖洪武实录》,卷七十。

②《明史》卷七十七,食货一。

③《明实录·太祖洪武实录》,卷一五〇。

④《明》《(万历)贵州通志》,卷二,《省会志·秩官》。

贵州行省建立的历史意义,除此前所论述的诸多方面外,其对贵州经济社会结构变化的促进作用不能不加以关注。随着建省以后交通的改善,移民、商人、工匠的纷至沓来,极大促进了贵州与中原和其他省区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而这正是黔中城镇兴起,贵阳市会地位确立,以贵阳为中心,黔中地区为依托,向周边地区辐射的经济发展格局形成的动因。

二、明朝时期黔中城镇的发展

古代贵州在地形地貌、交通条件的制约下,长期处于封建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边缘。除封建王朝或中央政府由于某种需要,将贵州问题提上议题外,大多数情况下,贵州都没有被纳入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宏观视野,这是贵州长期处于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这一因素,也严重制约了贵州城镇发展的进程。

明王朝的治黔方略,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并未摆脱历代统治者的思维方式,依旧出于完成大一统的政治目的,但它将贵州从湖广、四川、云南行省中分离出来,作为第13个省一级行政区划,建立贵州承宣布政使司,这对贵州融入国家经济社会生活起到了出乎统治者意料的促进作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有明一代,贵州高原突现出一股城镇建设之风。据明(万历)《贵州通志》的记载,从明初至明神宗万历年间,贵州共建城43座。其中,除省城贵阳系在两宋时矩州、贵州城,元代顺元城基础上扩建外,其余42座城镇均为兴建。

明代兴建的贵州城镇中,有的是府、州、县、卫、所的专城,有的是府、卫同城或州、卫同城。明万历以前,属于府一级专城的有思州、石阡、思南、铜仁4城;属于州城专城的有定番、麻哈、独山3城;属于县城专城的有务川、印江、永从、施秉4城;属于卫城专城的有威清、平坝、毕节、赤水、龙里、新添、平越、兴隆8城;属于所城专城的有黄平、普定、关岭、平夷、赤水卫前所、麇泥、阿白撒7城。此外的城镇则属府卫同城或州卫同城,其中,府卫同城的有都匀府与都匀卫、黎平府与五开卫、镇远府与镇远卫、安顺府与普照定卫等;州卫同城的有镇宁州与安庄卫、永宁州与安南卫、普安州与普安卫等;属于县卫同城的有清平县与清平卫等。^[1]

万历年间的平播战争后,贵州城镇兴建的步伐并未停顿。这一时期新增建的城镇不仅数量较多,建筑格式与规模亦较之前更显成熟。其中如开州城、广顺州城、安化县城、龙泉县城、永从县城、瓮安县城、余庆县城、湄潭县城、贵定县城以及敷勇卫城、镇西卫城,遵义军民府所属的真安州城、桐梓县城、绥阳县城且慢威远县城等,都属于此段时期所修建。

明代贵阳城经历了两次扩建,第一次发生在明太祖洪武十五年(1383年)。第二次大规模扩建,发生在明熹宗天启年间(1621—1628年)。

洪武十五年的改造着重贵阳内城。重点扩大城的北面,“依山麓为址,即今北城一带,改土为石,周九里有奇,高二丈二尺。”^[2]这次改造后,贵阳共有5门和2道水关。5门分别为昭文门、迎恩门、广济门、振武门和布德门,两道水关一为南明河,一为城北的水池。贵州建省以后,贵阳城市的发展明显提速,远超省境内其他市镇。到了明朝中期,作为省会的贵阳已堪称冠盖云集,商旅不绝的繁华都市。是时,城区街道纵横,以今大十字为中心修建了诸多牌坊、寺观、祠庙、楼台亭阁,除林立于街道两边的商铺外,城内形成了许多集市,其中有三牌坊市、四牌坊市、谯楼街市、凤宪坊市、小十字街市以及南市、北市等,在长期的城乡交流中,城外的定期集市同样兴旺,著名的有馆驿前市、十字街市、洪边巷口市、马荣街市等,数量多达十余个。

天启六年(1627年)统治当局于北城门外增砌外城六百余丈,设威清、六广、小东、红边4门。老城以外至新添的4门之间的城区,当时被称为新城。扩建后的贵阳状呈椭圆形。贵州承宣布政使司、贵州都指挥使司、贵州等处提刑按察使司、贵州卫指挥使司、贵州前卫指挥使司、贵州宣慰使司等衙署集中于城南,城北内外有大型商业市场12个,著名的有三牌坊市、四牌坊市、谯楼街市、凤宪坊市、小十字街市、馆驿前市、凤鸣桥市等。市街以大十字为中心向周边扩展,除东、南、西、北4大街外,更有一街、二街、三街、四街、五街、六街……寺观、祠庙、楼台、亭阁无不具备。^①经过天启年间的修葺扩建以后,贵阳府城已经与周边省会城市一样建造得较为规范。

安顺在明代的发展较为特殊,却也更能反映贵州城镇兴起的动因。该城素有“黔之腹、滇之喉”的军事战略定位。明军征讨云南的过程中,安顺的军事战略地位凸显出来,引起了朱元璋对安顺一带的高度重视。于是,在贵州尚未建省的情况下,有了将普安、普定、乌撒等土府及安顺、镇宁、永宁等州划归云南行省管辖的决定;有了明安

^①贵阳志编纂委员会编:《贵阳志·建置志》(内部资料),1983年9月。

陆侯吴复于洪武十四年在今安顺城区(时为阿达卜寨)筑城之举;更有了先于贵州建省31年,洪武十五年(1382年),即平定云南次年便设置贵州都指挥使司等措施。

明政府在安顺的筑城举措,推进了安顺作为黔中核心城镇崛起的步伐。安顺城于洪武十四年(1381年)12月动工修建城垣,历时3月,于洪武十五年闰2月17日竣工。清人许纘曾撰的《滇行纪程》一书中记述明初的安顺城时称:“环市宫室皆壮丽宏敞。人家以白石为墙,石片为瓦”,“提督驻此,以镇盘江。……明初设军民指挥使司,以襟带三州。”^①足见明代前期的安顺已是黔中地区的贸易、交通中心,有着扼控贵州,抑制云南的重要地位。明政府曾先后将该城定为普定卫城,升格为军民指挥使司,后又置安顺府。

在安顺城镇发展的进程中,政府的主导作用是十分明显的,而且很大程度上出于军事上的需求。这一点与明代贵州众多城镇的兴起有着共性。由于安顺地处黔中腹地,农耕条件相对优越,历史上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有着城镇建设的良好基础,有其他地区无可比拟的优势。洪武十五年的兴建如此,其后的历次修葺与扩容同样如此。

三、明朝黔中城镇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互动

明朝治黔方略导致的黔中城镇建设之兴盛,带来了一系列重要的历史成果。其中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是奠定了省会贵阳作为全省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二是初步建立起黔中地区在全省的核心统率地位。

经历了明朝前期百余年的大开发,贵州的社会经济结构与生产发展水平都发生了显著变化。这种变化最明显地表现在城镇的兴起及城镇性质的改变,尤其作为全省首府的贵阳,在这段时期里,逐渐由以军事、政治中心为主的城市,逐渐向省境经济、文化发展重心的转移。

元明之际,贵州农业生产的特点突出表现为“地广人稀”,随着明政府“调北填南”措施的推行,大批事实上属于军事移民的卫所士兵及其家属,被迁到贵州各地。按明代卫所制度规定,每卫士兵5600人,一人在军,全家必须相随前往,若每军士的家庭以5口计算,一个卫所设立后,士兵及其家属总计可多达2万余人。在以贵阳为中心的周边辖区,更是明政府戍守的重点,因而,军事移民的数量十分可观。万历《贵州通志》统计,仅贵州都司所辖18卫2所,即有“军户七万二千二百七十三户,二十六万一千八百六十九丁口。”^②

军事移民迁来的大量人口,绝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劳动力补充,当时留驻贵州的部队与建卫所迁入的军人及家属,基本上都来自中原、江南、两湖。他们的到来不仅带来了远较贵州发达地区的先进生产方式,更引进了诸多贵州高原此前未曾种植的农作物品种与手工业生产技术。这对明以前相对封闭的贵州而言,在生产观念、生产手段、生产方式等方面必然产生了冲击。当年军屯开垦出来的田土仅是贵州耕地中的一部分,如果加上民田,则耕地面积更多。有关文献记载,明初大开发中贵州都司辖境的屯田多达94.5320万亩,到万历九年(1581年),贵州布政司所属各司、府、州、县丈量出来的民田超过了134.45万亩。到万历三十年(1602年),仅黔中地区的贵州宣慰司即有民田349644亩,贵州军民府则有田111856亩,两者相加总计达461500亩。黔中地区农业生产发展的迅猛程度,从以上民田数即可见一斑。

农业生产的发展对贵阳城市地位的提升起到了极大的推进作用。也就是在明代开始,贵阳摆脱了从先秦至宋元以来只以军事要地引起统治者关注的局面,真正开始发挥一个省核心都会的作用,并引领着全省赶超先进发达地区的征程。

在交通与通信并不发达的单纯农业经济时代,光靠省城贵阳在省境的影响是有限的。在省城贵阳的核心地位确立以后,安顺府所辖地区的发展,与贵阳地区连成贵州腹地,生产力与生产水平均高于其他地区,对全省经济发展的带动效应得以显现出来,并对省境各地产生显而易见的影响。

明初的安顺(普定卫治)设有普利驿,该驿道为贵阳府经安平驿,过安顺后,西经镇宁州通往云南的主干道。此外,尚有纳尔里(今普定县)、比喇坝(今织金县)通往大定(今大方县)的驿道;由新添卫(今贵定县)经贵定(今贵定县旧治镇)、定番(今惠水县)、广顺州(今长顺县广顺镇)、驿马站(今双堡),以安顺为终点的驿道;自镇西卫(今清镇卫城)经柔远所(今平坝县齐伯)、驿马站(今蔡关镇)、跳蹬场、十二营长官司(今普定县白岩乡),抵达定南所(今普定县)的驿道,以及其他几条走向不同,由今安顺出发,通往杨武、驿马站等地的驿道。足见,由于某种

①(清)许纘曾撰《滇行纪程》,清同治七年(1868年),王云五主编《万有文库》,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

②(明)《(万历)贵州通志》,卷二,省会志。

原因统治当局的高度重视,当时的安顺虽然建城不久,交通已堪称四通八达。

伴随着全省经济发展中心地位的奠定,贵阳、安顺等黔中城市各项社会事业迅速兴旺,各类服务于社会发展的机构与建筑陆续诞生,尤其在商业、文化、教育等方面得到了突出的展示。此时,黔中已成为与周边湖广、云南、四川商业贸易主要交易市场,而省内其他地区的物资亦有相当数量在此集散,官户、民户、军户、匠户纷纷向此云集,商业也因之兴盛。

佛教传入贵州最早在黔北的思、播一带。入明以后,由于贵阳省会地位的确立,黔中佛教传播迅速扩散开来。当时,建于省城内的大兴寺,元代已修建完成,名为精舍。永乐年间建省以后,设贵州宣慰司僧纲司于寺后面。以后,城内的佛寺不断增多,城南一带建有万寿寺、黔明寺、准提庵,城北新建有铜佛寺,城外则建有东山寺、水月寺等。当时,佛教的传播不仅限于省城附近,远郊地区的集镇与农村也兴建了不少寺庙,如青岩堡建有龙泉寺、凤凰寺、狮子山寺,新贵县境建有来龙寺、朝阳寺等。

道教虽然于宋朝已传入贵州,但在黔中地区的传入时间为元代,发展则是在明朝。明正统十三年统治当局在贵阳设置道纪司,作为省内专门管理道教的机构。大道观发展到“常住有田,闻教有器,讲饌有席,居寝有所,以至台榭花木,园林蔬果无不有焉。”^①其后兴建的崇圣观,贵阳市郊的雪涯洞、仙人洞,定番州的真武观、东岳观等,都是道教传播的产物。在贵阳道观的引领下,省内府州县及卫所也纷纷建造宫观,一时间,道教在贵州境内外内的传播显得异常兴旺。

黔中王学的诞生与发展,是明代贵州文化领域的一大成就,王学的兴盛推动了城市文化的进步。除有名的“龙场悟道”及他所提出的“知行合一”学说外,创办了龙冈书院,开课授徒,应贵州提学副使毛科及其继任者席书的邀请,到贵阳文明书院讲学,为贵州培养了众多人才。他提出的“立志”、“勤学”、“改过”、“责善”四条规定,对贵州民风的开启,教育事业的发展,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王学弟子与再传弟子中,不少成为闻名遐迩的封建文人,促进了贵州文化的发展。

明代贵阳地区的教育伴随着城市的发展而进步。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朱元璋即令入京朝谨的贵州宣慰使安的,返乡后创建贵州宣慰司学,并为其选派出学官,这是明代贵州的第一所司学,也是明政府在贵州发展教育的首举。以后,贵州境内以儒学为主要内容的府、州、县学与卫学迅速得到发展,进而使明代变成成为贵州历史上学校教育发展的关键时期。建省以后,贵州教育的发展步伐加快。明代贵阳府境内的著名书院有魁山书院、中峰书院、文明书院、龙冈书院、阳明书院、正学书院等。

综观明代黔中城市的发展历程,可以明显地感受到,除元明之交大规模军事行动对其地位的提升外,明政府在贵州的统治建立后,中央王朝在贵州的建省举措以及在贵州开展的长达百余年的大开发,从经济方面进一步促进并稳定了贵阳、安顺作为贵州全省政治、军事、经济与文化的中心地位。而这两座全省中心城市地位的奠定,商业的繁荣与兴盛,又反过来有力地促进了贵州省境内的城镇建设,推动了全省尤其是黔中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

参考文献:

- [1] 贵州通史:第二卷[M].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261-271.
- [2] (道光)贵阳府志:卷一[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24-38.

责任编辑:常明明

^①(明)王训:《大道观记》,参见《(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贵州宣慰司》。